

目 录

关于《前言》部分·····	(1)
关于《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部分·····	(5)
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部分·····	(42)
关于《抗日战争》部分·····	(73)
关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部分·····	(109)
关于《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部分·····	(139)
关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部分·····	(166)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部分·····	(193)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开始》部分·····	(218)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以下简称《年表》）有一个简短的《前言》。《年表》的正文将中国共产党的六十年（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八一年七月）分为八个时期。其中的前四个时期，即“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属于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后四个时期，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开始”，基本上属于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下面，我们分别对《年表》的《前言》和八个时期的基本内容和特点，作一些必要的说明。这种说明是否妥当，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关于《前言》部分

《前言》简要地说明了《年表》编写的目的、原则和体例。

为什么要编写《年表》？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也是为了给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若干重要的参考资料。根据这个目的，我们在编写《年表》时采取了下列原则和体例。

一、力求反映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的全过程

既然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年表》当

然要力求反映这六十年的全过程。为此，除了用一个很短的绪论简要地介绍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条件、阶级基础、思想基础和建党的准备以外，《年表》的第一条大事是记一九二一年七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表明：

“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接着，《年表》即以主要篇幅简记了六十年来党史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最后一条是记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首都万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建党六十周年，记胡耀邦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回顾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并且在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可以说，这个回顾和总结，实际上也是对《年表》所记六十年来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科学概括。

二、对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全过程的反 映力求简明扼要

中国共产党的六十年，是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六十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经过反复实践而愈益结合的六十年，是党内正确纠正错误、光明面战胜阴暗面的六十年，因而也是经过无数艰难和曲折走向一系列胜利的六十年。这六十年的历史是极其丰富的，完全可以撰写成多卷本的巨著。但是，

《年表》的读者对象是广大的干部和群众，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地劳动和工作，不可能用很多时间去阅读大部头的著作。因此，《年表》的叙述力求简明扼要，使广大读者

有可能用较短的时间读完，并且能对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发展的轮廓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为此，我们在编写《年表》的过程中，始终注意从大量的历史档案、历史文献以及回忆资料中，反复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在六十年党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万千事变中，只精选了约六百条大事；对每件大事的介绍也力求简明，突出根本，删去枝蔓。“短些，短些，再短些！”《年表》的全文最后压缩到约十三万二千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册子。为千百万读者着想，我们认为这样做是适当的。

三、力求使《年表》简明扼要的介绍 能正确地反映中国共产党六十年 发展的客观规律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精选出六十年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这是编写《年表》的基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研究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弄清这些先后继起或同时发生的各个事件之间的内部联系和因果关系，也就是弄清党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编写《年表》时我们碰到的一个更难但又是非解决不可的问题。否则，将一件件大事互相孤立、互不联系地排列起来，那将是一本流水帐，只能给读者提供一堆杂乱无章的资料。显然，我们不能那样简单草率从事。

要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学研究，就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我们非常注意独立的科学研究，不受任何不合理的老框框的束缚。后面我们将以事实说明《年表》确实冲破了一些不合理的老框框，

对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我们认为比较合乎实际的独立的见解。但是，我们也应当严肃地说，这些独立的见解都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指导下，也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从认真分析综合大量资料中提出来的。这是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党史的实际，而不是为了哗众取宠。

四、《年表》的体例

这个小册子基本上是以年为单位、按时间顺序表述大事的，故称之为《年表》。但是，党史上同一时间往往发生许多事件，同一事件又往往延续或长或短的时间。如果机械地按年月日的顺序表述，那就势必把某些历史事件发展的完整过程分得零乱不堪。反之，如果把历时较长的某一历史事件过分集中地放在一起表述，那又势必打断这一历史事件同其他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这两种写法显然都不便于贯彻“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原则。因此，《年表》采取了基本上按时间顺序排列，又按事件和问题适当集中表述的体例。同时，根据党史上各个时期不同的特点，按时间顺序和按问题集中的程度又有所不同，以适应各个时期的实际情况。

关于《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部分

一、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轮廓

根据“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年表》从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亦称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发生的大量历史事件中精选了约六十件大事。这些大事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彼此密切联系的五个段落，勾画了我们党幼年时期发展的轮廓。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一九二一年七月到一九二三年二月）

党的创建有一个过程。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为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定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也就是直到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同国际上一切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本

质上相同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及其他剥削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党的“一大”还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党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而这样的纲领是作为一个完备形态的政党所不可缺少的。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功绩，就在于它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对中国革命规律的初步探索，确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第二步再转入社会主义革命，从而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党在成立后所进行的实际工作，主要是组织和教育工人，发动了第一次罢工高潮。这次罢工高潮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提高了党和无产阶级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信，为即将建立的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奠定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但是，由于北洋军阀的血腥镇压，二七惨案以后中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二）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三年 二月到一九二五年五月）

二七罢工的失败，使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孤军奋战是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的，必须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因而我党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大会以后，党的各级组织对广大党员进行思想教育，解除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疑

虑；同时积极推动孙中山、廖仲恺等加速改组国民党的步伐。党的三届一中全会规定了我党“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的方针及实施办法。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从此，我党即通过国民党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恢复和发展工农运动，发动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为内容的人民运动。并同国民党合作，创建了革命军队，镇压了反革命商团的叛乱，使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的重要性，制定了有计划地开展工农群众运动的方针。大会以后，党的工作迅速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加强了党的领导作用。经过近两年来的努力工作，各界民众已开始组织起来。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这就为行将来临的大革命风暴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三）五卅运动——第一次大革命的爆发

（一九二五年五月到一九二六年二月）

从一九二五年五月开始，在我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学生反对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特别是反对五卅惨案的斗争，迅速发展为全国范围的有各革命阶级参加的反帝革命大风暴。从此开始了中国革命史上空前未有的第一次大革命。在革命高潮中，广东革命势力平定了杨、刘叛乱，建立了国民政府和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政治骨干的国民革命军，胜利地举行了东征和南征，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但是，在北洋军阀统治的上海、武汉、青岛等城市的工

人运动，由于没有革命军队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有力支持，却不断遭到残酷的镇压，处境很困难。

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开始尖锐化，代表国民党新右派的戴季陶主义和代表国民党老右派的西山会议派相继出现。一九二五年冬和一九二六年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批判国民党右派的谬论，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在“二大”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为两步走，“四大”提出的无产阶级应当领导民主革命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四）北伐战争——第一次大革命发展为 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一九二 六年二月到十二月）

五卅运动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工人运动必须和农民运动相结合，民众运动必须推进到武装斗争的新阶段。这是五卅运动后革命继续发展的方向。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斗争形势，指出党的首要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决定在北伐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地加紧群众工作，特别要组织和发动农民群众支持和参加北伐战争。这时，蒋介石也在准备北伐，但其目的是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建立独霸全国的蒋家王朝。为了实现这一野心，蒋介石在北伐前夕连续制造了旨在限制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事件。由于陈独秀实行妥协退让的政策，蒋介石篡夺国民党党权、军

权、政权的阴谋得逞。革命预伏着危机。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北伐，开始了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北伐军在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援下，迅速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的主力，摧毁了他们在各地的反动政权。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工农革命运动亦随之蓬勃兴起。尤其是湖南、湖北的农村大革命猛烈地发展，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农民协会成了乡村的唯一权力机关。在城市，工人纠察队实际上也执行一部分政权的任务。这说明夺取政权的问题，已成为现实的根本问题。但是，陈独秀等从“二次革命论”出发，顽固地反对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夺取政权（《年表》原来缺少这方面的内容，准备补写），把北伐战争胜利的果实自愿地让给蒋介石集团。

（五）第一次大革命由胜利逐步转向失败（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到一九二七年七月）

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后，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北洋军阀的剩余势力已经不能危害全局。蒋介石把南昌的总司令部作为反革命中心，同革命的武汉政府相对抗。他集中力量勾结帝国主义，拉拢和组织国内反革命势力，准备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发动突然袭击。这样，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大众同北洋军阀的矛盾，开始转变为人民大众同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矛盾。蒋介石集团已由革命的同盟者变为革命的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看不见主要矛盾已经开始变化，仍把蒋介石视为联合的主要对象，幻想能同蒋介石共同完成消灭北

洋军阀剩余势力的任务。因此，陈独秀等不是集中力量发展工农运动，发动土地革命，扩大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以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叛变，而是限制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并尽力帮助蒋介石把势力扩大到上海、南京一带，幻想用这种让步的办法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继续革命。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不顾反对的意见，通过了接受陈独秀主张的决议，共产国际的代表也同意这个决议。这就使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从这时起，第一次大革命逐步由胜利转向失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抵制。但由于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大多数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缺少必要的认识，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还看不清楚，因而陈独秀得以坚持推行右倾投降主义。结果，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我党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大革命首先在上海、南京以及东南各省遭到失败。周恩来等统观全局，提出迅速东征讨蒋的正确建议，但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多数决策者所拒绝。接着召开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对如何争夺领导权，大会却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办法，因而没有能够在紧急关头挽救革命。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下，武汉汪精卫集团也由动摇转向反动，公然准备“分共”。陈独秀等实行投降式的让步，幻想以退让拉住汪精卫。汪精卫等却以为这是共产党软弱可欺，更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不顾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举

行“分共”会议；随后也同蒋介石集团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至此遭到惨重失败。

以上就是《年表》所勾画的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历史发展的轮廓。

二、关于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说明

在编写《年表》的过程中，我们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大量收集和分析有关这一时期的中共中央文件和第一手资料，并吸收近年来党史学界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对这一时期党的若干历史问题提出了我们认为比较合乎历史实际的独立见解，并增补了一些新内容。对若干具体史事也进行了考证工作。在这里，需要向读者加以简要说明。

（一）恢复李大钊、陈独秀在党的创立时期的历史地位

《年表》在“党的创立的绪论”里，三次提到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第一次：“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他们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组织工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第二次：“一九二〇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探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第三次：“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代表来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联系，帮助建立中国

共产党。”

写这些内容，是为了澄清林彪、“四人帮”关于党的创立时期所编造的谎言，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正如当时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同时，这样写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有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的，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探讨建党的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共产国际的帮助才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污蔑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从外国移植过来的，在国内没有基础，这完全是不符事实的胡说。

（二）关于“共产主义小组”

“共产主义小组”不是当时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统一名称。这个名称最早见于一九二六年俄人葛萨廖夫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九三六年陈潭秋为纪念中共诞生十五周年而写的《回忆党的“一大”》和米夫写的《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也使用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以后就沿用下来了。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各国党一般把第一次党代会以前成立的共产主义性质的名称很不相同的各种组织，统称“共产主义小组”或“马克思主义小组”。例如捷克、罗马尼亚、日本、朝鲜、印度等共产党“一大”前的共产主义组织，通称“共产主义小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的共产主义组织如“劳动解放社”、“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等，通称“马克思主义小组”。

一九二一年七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中国共

产党的早期组织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小组”，有的叫“共产党支部”，说法不一。为了避免混乱，《年表》沿用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一通称。

（三）党的一大通过了党纲

过去，一般的党史书都说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近几年来又说是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年表》则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党纲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

《年表》的记载，为什么同一般的说法不同呢？

查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出版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我们党的第一个党章是一九二二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是一九二三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是一九二五年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可见，党的一大并没有正式通过党章。

现在一般党史资料书上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的文件，是从俄文、英文两个本子转译过来的。两个本子的内容基本相同，可见一大确实通过了这个文件。但在“纲领”前面又加上“第一个”，这又说明并非一大通过的原文，而是后来加上去的。从内容看，这个文件既列了党的纲领的条文，又列了入党条件、入党手续、党的各级组织机构等等完全是党章性质的条文，可见这个文件并不只是党的纲

领。

这就是说，这个文件既不只是党章，也不只是党的纲领，而是将党的纲领和章程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文件。按当时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转载的兄弟党的文件看，这种将纲领和章程结合在一起的文件通称“党纲”。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身份签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说：“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需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从这个通告可以看出：一大没有正式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只选出了“中央局”，陈独秀的职务是“中央局书记”。一大通过的将党的纲领和章程结合在一起的文件是“党纲”。

这里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年表》写了一大代表的人数及其姓名，但关于二大到十一大的代表却只写了人数，没有写姓名。这是为什么？

近年来，有少数党史工作者下了很大工夫，详细地考证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其他会议的参加者的姓名，并发表了大量有关的考证文章。《年表》参考了这些考证的成果，将一大代表的姓名一个不漏地介绍出来。但是，这种介绍会给千百万读者什么印象呢？就陈公博、周佛海二人来说，有些读者知道他们的底细，这当然不会发生什么疑问。但是，也有些读者并不了解他们是什么人。如果《年表》只介绍他们是一大代表（后文又不能再介绍他们），不了解他们的读者就可能误认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党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为了防止发生这种误解，《年

表》又加了简要的注释，说明陈公博、周佛海在一大以后很快就叛党了，后来又堕落为汉奸。这就说明他们不过是偶然混入党内的政客，在党史上并没有起过积极作用，根本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我们认为，《年表》这样介绍曾经出席过一大的陈公博、周佛海是必要的。但是，这种介绍同阐明党史发展的规律并没有重大关系，后来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有多至几十人、几百人以至一千五百多人的，如果将这些代表的姓名一一写出来，对其中的许多人又一一加以注释，那势必必要占《年表》的很大篇幅。《年表》的篇幅很有限，如果不将很有限的篇幅集中起来用以介绍同党史发展规律有重大关系的大事，却浪费许多笔墨去介绍陈公博、周佛海之类的人物，那至少是本末倒置，甚至会在千百万读者面前模糊以至歪曲党史的真面目。因此，除一大以外，《年表》对二大到十一大的代表都不写姓名，只写人数。代表人数从十多人增加到几百人以至一千五百多人，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们党的发展壮大，应当说是党史上的大事，是《年表》必须写清楚的。

（四）党的二大制定了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纲领

《年表》简要地介绍了党的二大所制定的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这一介绍同一般党史论著是相同的。应当说明的是，一般党史论著都比较强调一九二二年一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远东民族会议”）对中国共产党二大制定纲领的

重大影响。我们认为，这次会议对中国革命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这种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年表》没有介绍这次会议，而着重地指出，党的二大所以能制定出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纲领是“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这里写的是两个要点：一是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我们认为，列宁的这一理论不但包括了远东民族会议的基本精神，而且比这次会议的精神更全面，更深刻，对中国共产党二大的指导意义更大，影响更深远。二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年表》指出，没有等到二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就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六月间党发表的对时局宣言中，明确地提出了建立民主主义的革命联合战线以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政治主张。《年表》还指出，二大宣言“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这些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分析，也远非远东民族会议的一般号召所能比拟。概括地说，《年表》着重写的这两点，就是简要地反映当时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开始结合起来的重大意义。

（五）党的三大反对两种倾向的问题

过去的一般提法是：三大一方面反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另一方面反对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不分主次。从当时党内的思想状况来看，主要倾向还是不愿意加入国民党、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思想。